

引用格式:黄一诺,路之纤,余可欣,等.精准扶贫背景下建档立卡脱贫户增收效果评估[J].资源科学,2022,44(9):1891-1904.
[Huang Y N, Lu Z X, She K X, et al. Income-increasing effects of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in the contex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891-1904.] DOI: 10.18402/resci.2022.09.12

精准扶贫背景下建档立卡脱贫户增收效果评估

黄一诺¹,路之纤²,余可欣³,李国平¹,刘慧迪²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要:衡量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脱贫效果稳定性对“十四五”期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四川省广元市3个县的精准扶贫数据库,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建档立卡户脱贫前后收入变化情况,并按来源分类对收入展开分析,探究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发现:①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在脱贫前一年迅速提升,脱贫后的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最显著且具有可持续性,这主要源于当地“造血式”扶贫措施,包括推动就近务工和东西部就业扶贫协作、发展农业产业园区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等。②围绕不同的致贫原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因病、因残和因缺技术致贫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均在脱贫后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残疾和因缺技术而致贫的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在脱贫后得到了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脱贫动态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精准扶贫;增收效果;建档立卡脱贫户;事件研究法;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法;异质性分析;四川省广元市

DOI:10.18402/resci.2022.09.12

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精准扶贫方略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户,进而针对不同致贫原因精准施策,到2020年底,已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县全部摘帽,成功消除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与此同时,扶贫工作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成为了新的重要议题。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央建立长效的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县设立五年过渡期,期间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基于此,衡量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把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前后的收入变化趋势,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目标是通过农村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现有文献中鲜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质量动态变化的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3个研究问题:

①扶贫措施对贫困户在脱贫后的增收效果相对于脱贫前是否有明显差异;②脱贫户的增收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更具体地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是借助“外部输血”还是“自我造血”的方式获得增收;③帮扶政策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脱贫户增收的效果如何。

基于四川省广元市3个县精准扶贫数据库,本文以2013—2020年3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总体对象,探究建档立卡户在脱贫后的短期和中期收入情况。为了更加具体地研究“建档立卡”及其配套政策对于脱贫户脱贫前后收入的影响,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剖析建档立卡户在一系列帮扶措施后的增收效果。不仅分析了贫困户在脱贫前后收入动态变化,还围绕不同致贫原因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本文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围绕产业发展、整合农村资源、就业扶贫等方面对优化扶贫措施提出建议,可为相关部门切

收稿日期:2022-05-05 修订日期:2022-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2)。

作者简介:黄一诺,女,福建福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 huangyinu@pku.edu.cn

通讯作者:李国平,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 lgp@pku.edu.cn

实把握政策实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政策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综述

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减贫效果。有学者认为,“建档立卡”具有精准识别贫困户的作用^[1,2],显著降低整体贫困发生率,但对于贫困户的各类收入和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3]。②刻画不同类型精准扶贫项目对于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吴本健等^[4]认为金融扶贫比财政扶贫更有利于中长期提高深度贫困户的增收,而章贵军等^[5]指出金融扶贫项目提高农户收入,并优化其收入结构。平卫英等^[6]探讨了就业扶贫的增收效果,发现就业扶贫显著提升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家庭纯收入。胡晗等^[7]发现,产业扶贫政策虽然帮助本地贫困户实现了增收,但对外出务工的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并不显著。③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于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效果。沈宏亮等^[8]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精准扶贫对建档立卡户的家庭纯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乔慧等^[9]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发现中国中西部部分省份通过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性收入,但农业经营收入与外出就业所带来的转移就业收入的增收效果不明显。这间接说明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转移支付,但并没有提高贫困家庭自身的发展能力。

然而,现有文献多关注扶贫措施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短期内的增收效果,并未针对致贫原因详细考察脱贫户的收入及结构的变化情况。另外,以往文献大多使用抽样调查数据库,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3个贫困县的贫困人口微观调查数据库,同时结合实地调研结果,深入考察当地的产业发展、农户生活和扶贫工作,衡量建档立卡户在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后增收的可持续性,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文献的不足。

2.2 理论分析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分析减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提供一种理论视角。可行能力由一系列可实现的生活需要的功能性活动组成。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消除贫困需

要从各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10]。根据可行能力理论,精准扶贫的脱贫增收效果及其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帮扶措施是否有效提高了贫困人口的各项可行能力。根据精准扶贫帮扶措施是否直接提高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可以将这些帮扶方式简单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提高贫困人口能力的“造血式”帮扶,如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措施^[11,12];另一类是通过转移支付等直接增加特定贫困人群收入的“输血式”扶贫^[13],如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造血式”扶贫措施的增收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户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等方面,而“输血式”扶贫的增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农户转移性收入方面。

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就业扶贫及部分产业扶贫项目。通过在本地发展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或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在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的同时,还通过就业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户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提升其发展能力,有助于脱贫增收效果的持续发挥。

生产经营收入的增加主要是发展产业带来的。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政策的重点内容。在贫困地区发展种养、加工、休闲农业、旅游等产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带动农户发展家庭经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贫困人群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可行能力的提升,达到持续性的脱贫增收效果。但在推进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多数扶贫产业依靠当地特色农牧、自然资源发展,容易出现项目雷同、发展同质化。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有些甚至需要依靠干部推销、政府采购等方式完成销售。在缺乏扶贫项目的关注后,可能面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14],影响增收效果的可持续性。

精准扶贫阶段转移性收入也是贫困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精准扶贫中的公共转移支付起到为贫困群体提供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保障发展空间有限的家庭的基本生活和缓解已发生的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公共转移支付虽然能直接有效增加贫困群体收入,但仍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带来的收入提升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人口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激励”效果,使贫困人口产生福利

2022年9月

依赖,降低贫困家庭的劳动供给意愿,不利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提高^[15,16]。

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土地流转的租金、参与合作社等的分红以及储蓄收益等。该部分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小。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由于贫困户家庭储蓄水平较低,获取分红收入存在一定时间滞后等,该类收入受到精准扶贫项目的影响有限。

3 研究对象、数据与模型构建

3.1 研究对象

本文所研究的四川省广元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山区。2013年底,广元市精准识别贫困村739个、贫困人口34.82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0.76万户;贫困发生率为14.6%,高出全国贫困发生率4.4个百分点。广元市下辖区中的7个县均为贫困县,也同为川陕革命老区、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特区。广元市制约经济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广元市地处边远山区与高寒山区,干旱、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极大限制了该地区群众的生产发展。第二,广元市的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薄弱。第三,广元市经济结构较为传统,产业发展水平落后。地方土地分散,耕种条件差,以传统种养业和分散经营为主,特色产业不足。第四,广元市贫困劳动者就业技能较为欠缺。2013—2020年底,广元市在脱贫攻坚的推进过程中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采取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集体经济、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以及社会扶贫等扶贫措施。截至2020年底,广元市内739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3.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四川省广元市3个县精准扶贫数据

库。包含2013—2020年度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期间,广元市3个县在市县、村级、户级和个体层面的基本信息以及各项扶贫措施实施情况。在32293户全样本中,2014年脱贫4709户,2015年脱贫6174户,2016年脱贫6314户,2017年脱贫6700户,2018年脱贫6223户,其余2173户在2019年全部脱贫。大部分样本户都在2014被识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余为后续年份识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更精确地识别因果效应,本文的分析选用2014年识别的30120户贫困户样本(共127271个观测值)。

3.2.2 变量定义

自变量为家庭在当年是否脱贫。因变量是建档立卡户的家庭年收入及分来源的收入。根据收入来源,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要收入可划分为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根据四川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将所有类型收入均以201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其中家庭转移性收入基本来自于扶贫政策下的政策补贴,不属于生计资本,但由于获得补贴的条件与贫困户自身物质与自然资本有关^[17],所以本文仍将其纳入考虑。图1展示了建档立卡户的各类收入。

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包含了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对于性别变量,男性个体取值为1,女性为0。对于受教育程度变量,个体教育水平是文盲或半文盲取值为0,小学取值为1,初中取值为2,高中取值为3,大专取值为4,本科及以上学历取值为5。对于健康状况,个体患有大病取值为0,残疾取值为1,患有长期慢性病则取值为2,健康则取值为3。劳动能力方面,个体有正常劳动能力取值为1,丧失或无劳动力则取值为0。与自变量农户层面收入相对应,在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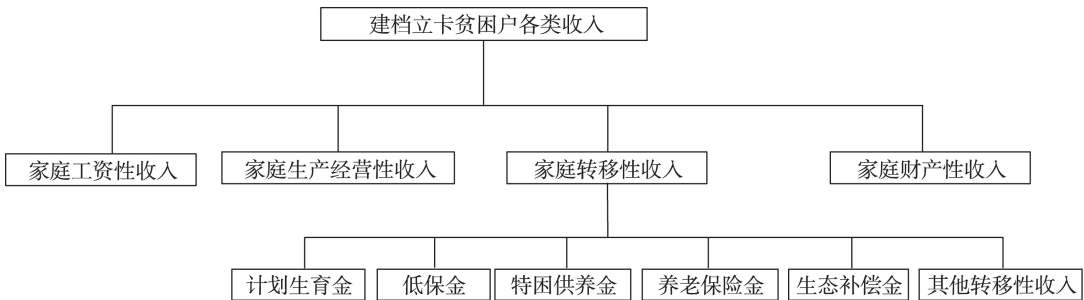


图1 建档立卡户的收入构成

Figure 1 Income composition of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层面的变量包括家庭人数、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男性占比、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平均健康状况和家庭成员中劳动力占比。

本文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均值为5266.2元,人均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均值分别为3236.8元、1435.0元、1234.7元和34.8元。家庭平均年龄为44.8岁,家庭平均人数为3.3人,劳动力比例均值为0.6,家庭中男性比例均值为0.5。

3.3 模型构建

3.3.1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首先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脱贫前后收入的动态变化。样本中贫困户脱贫时

间分布为2014—2019年,按照脱贫年份的不同将贫困户划分为6类群体(如2014年脱贫户)。

(1)基本趋势

以2013—2019年份为横轴,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为纵轴,绘制出6类群体收入随时间变化趋势线(图2)。在脱贫前2年至前1年,每条线对应的收入都呈现出较之前更快的增长趋势,脱贫后收入增长速度归于平缓,但仍高于增速上升之前的增长速度。

(2)事件研究法模型

在刻画收入随时间变化的基础上,以脱贫为冲击事件,研究脱贫前后每一年度贫困户收入的动态变化。在样本中,大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是在2014年被识别认定为贫困户,故仅选用2014年建档

表1 2014—2020年农户层面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ousehold level variables, 2014-2020

| 变量 | 均值 | 标准误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因变量 | | | | |
| 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 5266.2 | 3138.9 | 294.1 | 47030.4 |
|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元 | 3236.8 | 3270.5 | 0.0 | 44285.7 |
| 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元 | 1435.0 | 2232.6 | 0.0 | 12571.4 |
|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元 | 1234.7 | 1406.8 | 0.0 | 38980.9 |
| 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元 | 34.8 | 337.7 | 0.0 | 37383.2 |
| 控制变量 | | | | |
| 家庭人口/人 | 3.3 | 1.4 | 1.0 | 9.0 |
|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岁 | 44.8 | 14.3 | 4.0 | 97.0 |
| 家庭男性比例 | 0.5 | 0.2 | 0.0 | 1.0 |
|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年 | 1.4 | 0.7 | 0.0 | 5.0 |
|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 | 2.4 | 0.5 | 0.0 | 3.0 |
| 家庭劳动力占比 | 0.6 | 0.3 | 0.0 | 1.0 |

注:本文将劳动力定义为年龄处于15~64岁且有劳动能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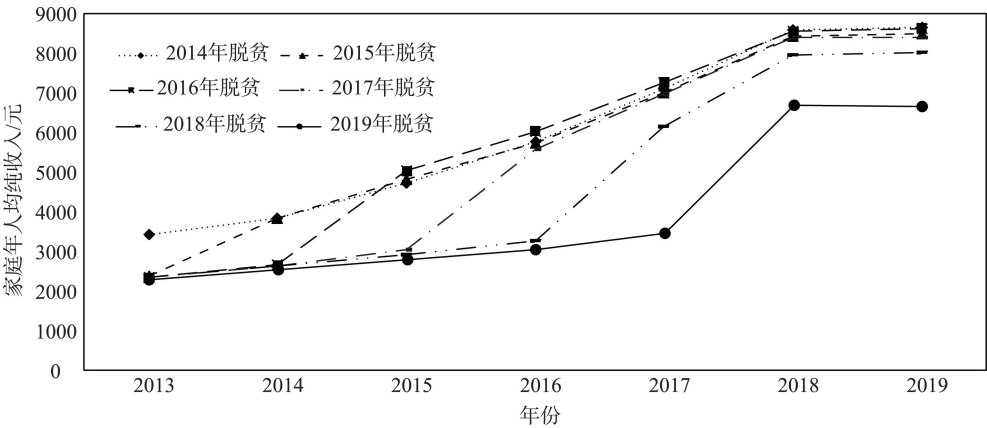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19年脱贫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变化情况

Figure 2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households lifted out of poverty, 2014-2019

2022年9月

立卡的贫困户样本。事件窗口设定为从冲击发生之前的两期到事件发生后的两期(-2至2期),脱贫的冲击发生在0期,以-1期为基准期,保留同时可以观测到这5期的样本,即分别在2015、2016、2017年脱贫的个体。事件研究法的样本情况见表2。

事件研究法的模型设定如下:

$$income_{it} = \sum_{t \neq -1} \gamma_t + \alpha X_{it} + u_c + v_t + \delta_{c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表示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t 表示年份, c 表示农户所在的县; $income_{it}$ 是农户当年人均纯收入; γ_t 是相对于脱贫年份(0期)的年份虚拟变量($t = -2, 0, 1, 2$),以脱贫冲击发生的前1期(-1期)为参照期。 γ_t 为关心的参数,表示 t 期因变量相对于-1期的变化; X_{it} 为其他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数、家庭人均年龄、人均教育水平、人均健康水平、劳动力占比等); α 为待估系数; u_c 是县固定效应; v_t 是年份固定效应; δ_{ct} 是县级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ε_{it} 是随机干扰项,并将聚类稳健标准误设定在县级层面进行计算。本文将因变量分为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并对此进行事件研究法分析。

3.3.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

在采用事件研究法估计脱贫户脱贫前后农户人均收入的动态变化后,本文进一步估计脱贫对农户收入的平均效应。为了剔除掉其他共时性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方法,即找到同时期没有脱贫的农户,其收入变化反映了除脱贫以外的其他共时性因素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income_{it} = \alpha + \beta TP_{it} + \gamma X_{it} + u_i + u_c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TP_{it} 表示该家庭 i 在第 t 年是否脱贫,脱贫则取值为1,反之则为0; ε_{it} 是扰动项。计量回归模型的聚类标准误将设定于县级层面。系数 β 是本文关心的核心系数。

在未脱贫的情况下,脱贫者与未脱贫者的收入

表2 事件研究法样本描述

Table 2 Sample description of event study

| 脱贫年度 | 识别年度 | 样本数/户 |
|------|------|-------|
| 2015 | 2014 | 40031 |
| 2016 | 2014 | 42680 |
| 2017 | 2014 | 44748 |

变动趋势是大致相同的,即满足双重差分法的长期平行趋势假设。但长期趋势相同的假定不一定完全成立^[18],因此本文先对脱贫户和非脱贫户的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在保证两组之间的同质性和长期趋势一致性假定成立的情况下,再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部分文献采用混合匹配方法,但却可能存在“时间错配”的问题或“自匹配”问题^[19],导致双重差分法退化为差分法,无法控制时间效应。因此,本文进行了逐期的倾向得分匹配,限制仅在同期的控制组个体寻找最合适的匹配^[20-22]。结合已有文献,选择的匹配变量包括农户平均年龄水平、教育水平、健康程度和家庭中的劳动力比例,并采用1:1近邻匹配法。

4 结果与分析

4.1 事件研究法的主要结果及解释

脱贫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的事件研究法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0期对应该农户家庭脱贫的年份。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从-2期到-1期,人均收入显著上升。扣除其他影响因素,年人均收入在一年间约提高1509.258元。相比于基期(-1期),脱贫当期收入略有上升,之后保持平稳,脱贫后3年增收效果总和仅为145.181元。可见,在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贫困标准后,收入增幅趋缓。图4中针对不同类型收入的事件研究法分析结果表明,一系列精准扶贫措施主要用于提升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而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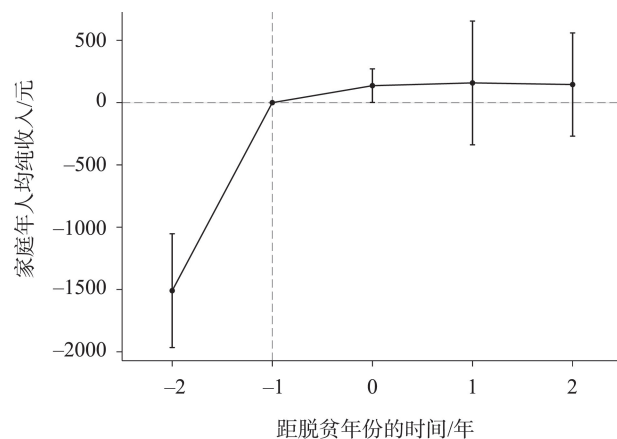


图3 脱贫事件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Figure 3 Impact of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households

表3 脱贫户收入变化的事件研究法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event study model

| 因变量 | (1)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 (2) 工资性收入 | (3) 经营性收入 | (4) 转移性收入 | (5) 财产性收入 |
|----------------|---------------------------|-------------------------|-------------------------|-------------------------|---------------------|
| 相对年份 | | | | | |
| -2 | -1509.258*** (106.122) | -915.891** (160.712) | -703.512** (112.508) | -169.337* (55.956) | -11.972 (7.501) |
| 0 | 136.381** (31.329) | 155.706 (68.393) | -21.589 (16.633) | -53.563 (72.565) | -12.777 (13.697) |
| 1 | 158.020 (115.526) | 188.599 (149.819) | -54.322 (65.650) | -78.514 (153.865) | 6.809 (11.999) |
| 2 | 145.181 (96.285) | 173.830 (226.201) | 46.453 (101.512) | -124.751 (242.253) | -1.418 (12.233) |
| 平均年龄 | 59.342** (9.792) | 79.365*** (7.234) | 40.406* (10.458) | -35.427** (4.541) | -3.721 (2.504) |
| 平均年龄的平方 | -0.702** (0.120) | -1.236*** (0.059) | -0.223 (0.125) | 0.573** (0.060) | 0.041 (0.029) |
| 平均教育水平 | 260.128 (107.689) | 406.696** (90.781) | -106.091** (14.275) | -86.557* (23.029) | -0.763 (2.334) |
| 平均健康水平 | 246.331*** (18.352) | 715.001*** (64.598) | 130.816 (56.676) | -524.633** (68.962) | -9.034 (5.875) |
| 家庭人数 | -240.016* (65.683) | 15.088 (22.122) | -129.753 (46.768) | -184.625** (35.631) | -6.105 (3.458) |
| 家庭劳动力占比 | 870.427*** (81.338) | 1630.267*** (60.756) | -16.481 (87.324) | -720.733** (111.328) | -3.604 (6.226) |
| 家庭男性比例 | 697.339** (161.561) | 926.267** (141.864) | -273.946 (100.212) | -39.487 (49.323) | -9.724 (6.669) |
| 观测值 | 91069 | 91134 | 91134 | 91134 | 91134 |
| R ² | 0.421 | 0.403 | 0.067 | 0.398 | 0.015 |

注:因变量收入以元为单位,列(2)-(5)因变量是4类细分收入。各列回归均控制县、年份、县-年份固定效应。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在家庭人口层面取平均值。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同。

入的增加并不显著。同时,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广元市用于巩固脱贫成果的财政资金仍然只增不减,对于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明察暗访,以降低脱贫户收入下滑的风险。回归结果见表3列(2)-(5)。

4.1.1 工资性收入

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与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相似,均在脱贫前一到两年迅速上升,而脱贫后的3年基本保持稳定工资性收入的变化可以由非农工资性收入与农业工资性收入两方面进行解释。

非农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异地或本地务工收入。在精准扶贫期间,“浙江-广元市东西部就业扶

贫协作”项目是贫困家庭劳动力劳务输出主要途径之一,政府在全面摸清广元市贫困群众的就业情况与就业意愿的基础上,整理互通劳务信息并组织浙江企业来广元市开展县镇乡招聘活动。东西部扶贫就业协作模式不仅帮助广元市依托浙江技术力量对贫困户进行各类就业技术培训,还充分调动了贫困群体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利于其获得稳定且可持续的工资性收入^[23,24]。在就近务工方面,广元市A县整合建立务工信息互通渠道,定期组织劳务培训,并组织群众参与周边招聘会,以促进非农就业,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

农业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本地农业产业园区提供的工作岗位。广元市的多数农村家庭是男主

2022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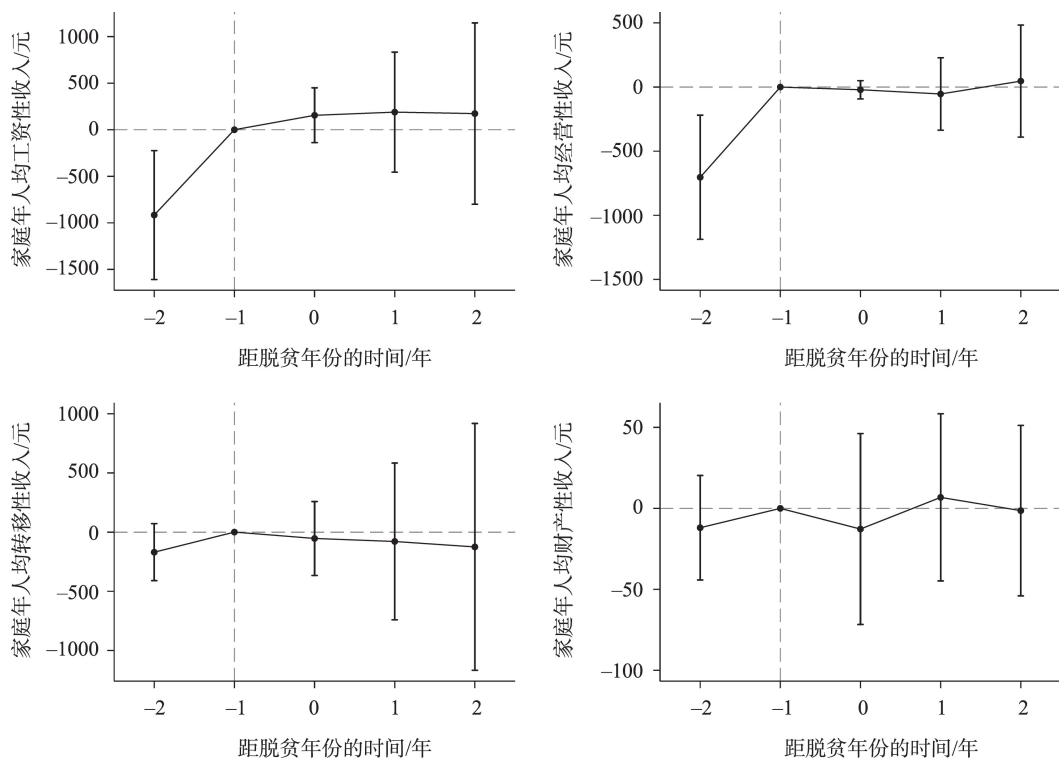


图4 脱贫事件对家庭各类收入的影响

Figure 4 Impact of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income

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男性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女性照顾家庭。村级集体发展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可以吸纳留在村中的妇女与老人就业,增加贫困户家庭的劳动供给。在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使贫困户家庭获得工资性收入。这种多渠道且短期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好匹配了本地需要照顾家庭、年老、因病或残疾等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户的需求。此外,该类农业工资性收入的稳定性依赖于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研究样本中的广大农村地区产业项目的多样性降低了总体运营风险,保证了此类型劳动收入的农户增收的稳定性。

4.1.2 经营性收入

家庭年人均经营性收入在-2期到-1期间同样显著上升,而在-1期的水平小幅波动,-1期之后的系数不显著。经营性收入之所以在脱贫前迅速提升,而在脱贫后总体平稳并伴有微小波动,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①以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有赖于个人素质能力和财政支持。如样本所在地区的一些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并得到小额贷款后,其经营性年收入迅速提高,最高达50万元。但类似的

成功案例不具有普适性。②经营产业的发展情况还与所在地区市场环境有关。部分地区发展产业在脱贫前过度依赖于外部帮助,甚至需要依靠干部推销、政府采购、直播助农等方式完成产品销售,并未建立健全自主发展能力,导致在脱贫后经营性收入在后期存在波动。总体来说,虽然广元市开展了金融扶贫试点,利用扶贫小额信贷、乡村互助基金以及创业担保基金支持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扶持创业等方式促进增收,但个人能力、自然环境、配套政策、产业资源禀赋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经营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4.1.3 转移性收入

家庭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在脱贫前1~2年呈现小幅度的上升,而后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并不显著。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低保金、特困供养金、养老保险金、计划生育金等。在脱贫后转移性收入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有二:①脱贫后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成为脱贫户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对转移性收入的依赖降低,更多扶贫资源向条件更加困难的贫困户倾斜。②广元市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本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带动下,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由投资组合理论可知,当总投资数量有限时,增加一个项目的投资必定要减少对另一个项目的投资^[25]。在精准扶贫资金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大多数资金用于“创新产业扶贫”等造血式帮扶项目,则会挤出一部分的“转移性支付”等直接输血式扶持项目。

此外,转移性收入下降趋势也间接说明,广元市3个县的扶贫工作更加注重激发与培育贫困户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鼓励贫困户发扬勤劳致富精神。例如,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动员贫困群体参与劳动;鼓励广元市贫困村建设农民夜校、讲习所,通过日常宣传和物质奖励帮助贫困户在物质和精神上双脱贫。

4.1.4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最低。从实证结果看,财产性收入在脱贫前后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差异,且方差较大。通过实地调研,广元市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于流转土地租金和土地入股分红。根据国务院2016年颁布的《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户流转土地的收入在土地确权后相对固定。而土地入股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提出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之一,农民以自家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股份,入股合作社或者农企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并以此为依据参与利润分红。在现实中,农户分红收入的取得一般与产业经营周期一致,所以该类收入有一定的滞后性(如广元市A县的黄茶产业园是每3年分红1次),并不能立即带来贫困户当年的收入增长。总的来说,财产性收入受扶贫措施影响有限。

4.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主要结果及解释

匹配后样本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于表4所示。由于每个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符合平衡性检验的要求。同时,匹配后分布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满足共同支撑条件。本文将使用匹配上的样本估计脱贫带来的效应,从而保证匹配的质量。

表5展示了脱贫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倾向得分-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列(1)是分别加入农户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是进一步加入县与年份交乘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脱贫户比未脱贫户的收入平均提高大约1553.895元。所得的结果与事件研究法的趋势结果基本一致。

表4 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 4 Balance test results

| 变量 | 样本 | 均值差异检验 | | 标准化差异检验 |
|---------|-----|--------|--------|---------|
| | | 处理组均值 | 对照组均值 | 标准化差异/% |
| 平均年龄 | 匹配前 | 45.177 | 42.662 | 17.8 |
| | 匹配后 | 45.157 | 45.669 | -3.6 |
| 平均教育水平 | 匹配前 | 1.387 | 1.385 | 0.4 |
| | 匹配后 | 1.387 | 1.352 | 5.5 |
| 平均健康水平 | 匹配前 | 2.485 | 2.463 | 4.8 |
| | 匹配后 | 2.485 | 2.470 | 3.2 |
| 家庭劳动力占比 | 匹配前 | 0.594 | 0.578 | 5.1 |
| | 匹配后 | 0.594 | 0.584 | 3.2 |

表5 采用PSM-DID估计的脱贫事件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

Table 5 Results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 model

| | (1) | (2) |
|----------------|--------------------------|--------------------------|
| | 农户人均收入 | 农户人均收入 |
| 脱贫 | 1528.278*** (133.194) | 1553.895*** (125.269) |
| 平均年龄 | 2.940 (2.463) | 2.355 (2.393) |
| 平均教育水平 | 169.138 (109.331) | 180.407 (80.287) |
| 平均健康水平 | 149.170* (41.436) | 148.074** (19.569) |
| 家庭劳动力占比 | 1315.292*** (85.480) | 1304.562*** (112.809) |
| 常数项 | 876.337 (302.132) | 819.200* (219.287) |
| 农户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县-年份固定效应 | 否 | 是 |
| 观测值 | 88890 | 88890 |
| R ² | 0.498 | 0.508 |

注:表格报告了采用PSM-DID方法估计的脱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变量为农户当年人均收入,单位为元。

4.3 致贫原因异质性分析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对于不同致贫原因的家庭,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性。样本中各致贫原因人数及占比如表6所示。由于因病、因残、因缺技术与因学为主要致贫原因,占比超过90%,且农户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般为工资性收入,故本文在致贫原因的异质性分析中主要讨论因病、因残、因缺技术与因学致贫户在脱贫前后的工资性收入的动态变化。

2022年9月

4.3.1 因病致贫

在广元市3个县的样本中,因病致贫的贫困户所占比例最高,达58.95%(表6)。由图5可知,因病致贫户的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在-2到-1期迅速上升,其后的3年只有小幅度提升。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在脱贫前迅速上升,之后保持稳定,说明提高因病致贫户能力和机会的“造血式”扶贫措施成效显著。据了解,当地政府先后多次通过新农合倾斜保障报销、民政救助、医院减

免、财政兜底等多种措施,使患病群众完全或部分恢复劳动力并参与劳动或从事经营性工作。另外,当地政府为因病致贫户及家庭劳动力健康水平较差、丧失部分劳动力的贫困户提供了灵活的公益性就业机会,提高其工资性收入水平。这种具有“造血”性质的帮扶政策可进一步凸显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推动长期内部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4.3.2 因残致贫

根据表6,因残致贫的贫困户所占比例为15.34%,在所有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二。图6展现因残致贫的贫困户在脱贫后的各类收入增收趋势,其工资性收入同样在-2到-1期迅速上升,而后的3年出现大幅提升。工资性收入之所以在脱贫前迅速上升,而后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主要由于向因残致贫户倾斜的就业岗位,通过吸纳因残致贫者参与简单的轻体力公共服务,使其有机会发挥劳动能力因而自力更生,有别于传统“输血式”扶贫方式。

4.3.3 因缺技术致贫

根据表6,因技术致贫的贫困户人数占比为10.54%,位列致贫原因的第三位。图7显示,工资性

表6 不同致贫原因的户数及占比

Table 6 Causes of poverty and proportions of the households

| 致贫原因 | 户数 | 比例/% |
|---------|--------|--------|
| 因病 | 75024 | 58.95 |
| 因残 | 19523 | 15.34 |
| 因缺技术 | 13408 | 10.54 |
| 因学 | 8825 | 6.93 |
| 因缺资金 | 4911 | 3.86 |
| 因交通条件落后 | 2081 | 1.63 |
| 因缺劳力 | 1818 | 1.43 |
| 其他 | 1681 | 1.32 |
| 总计 | 127271 | 1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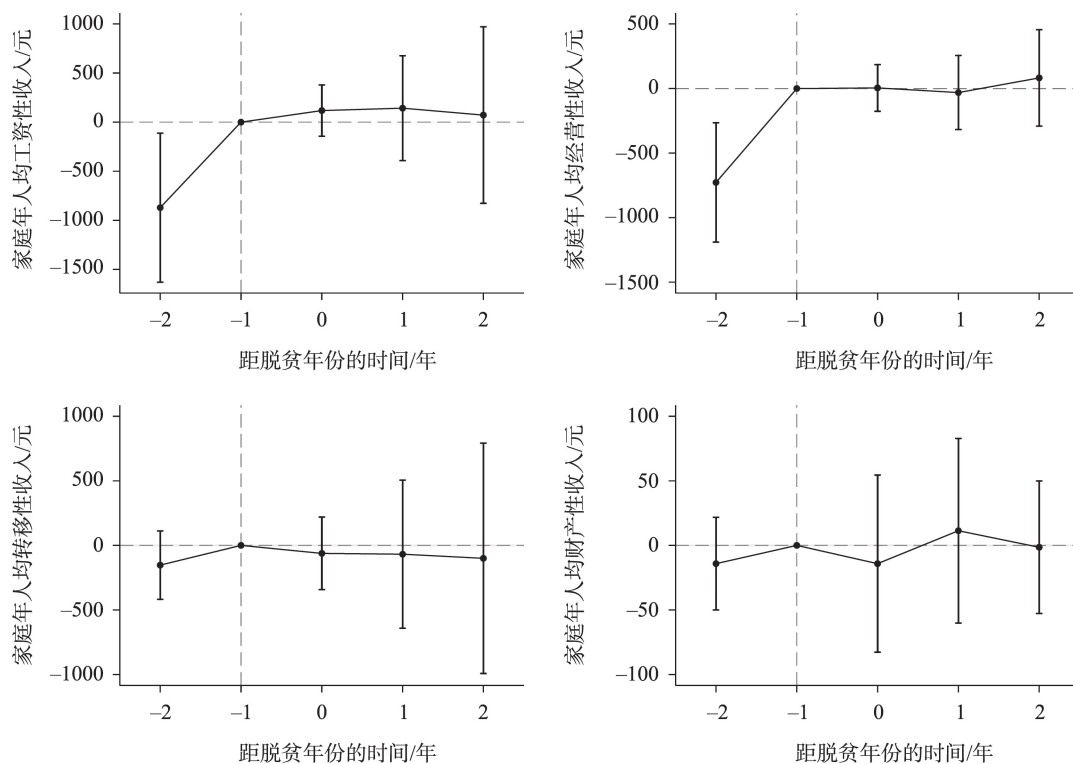


图5 脱贫事件对因病致贫的家庭各类收入的影响

Figure 5 Impact of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income of households impoverished by ill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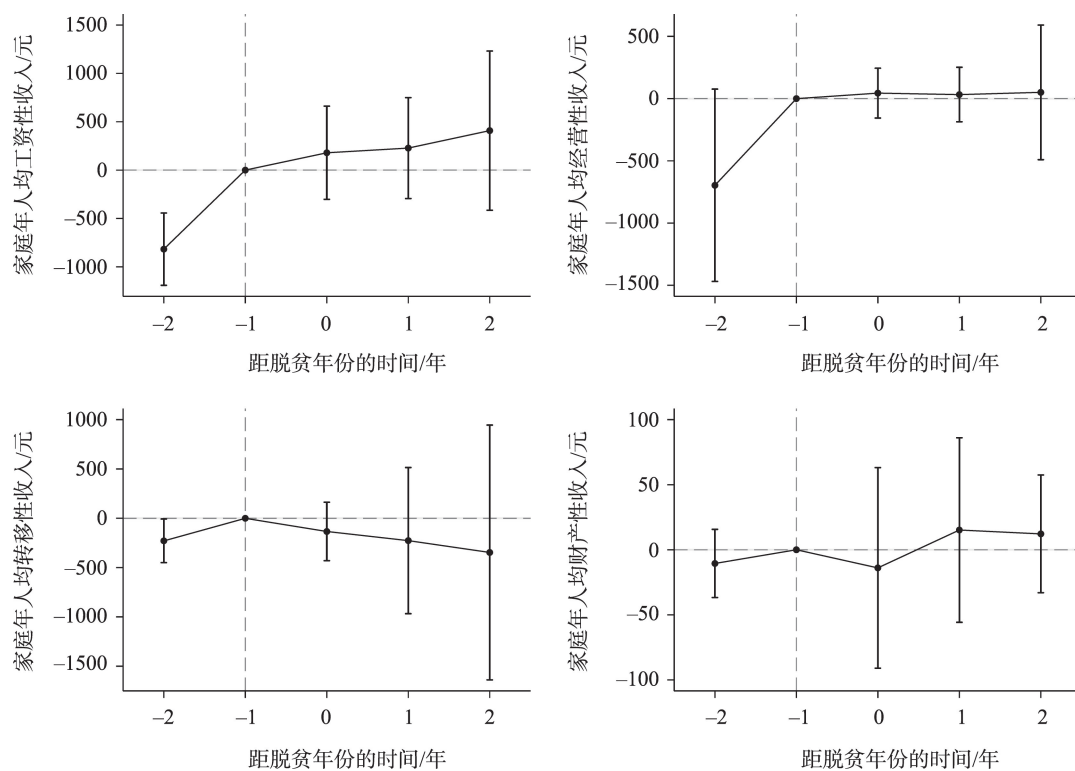


图6 脱贫事件对因残致贫的家庭各类收入的影响

Figure 6 Impact of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income of households impoverished by disa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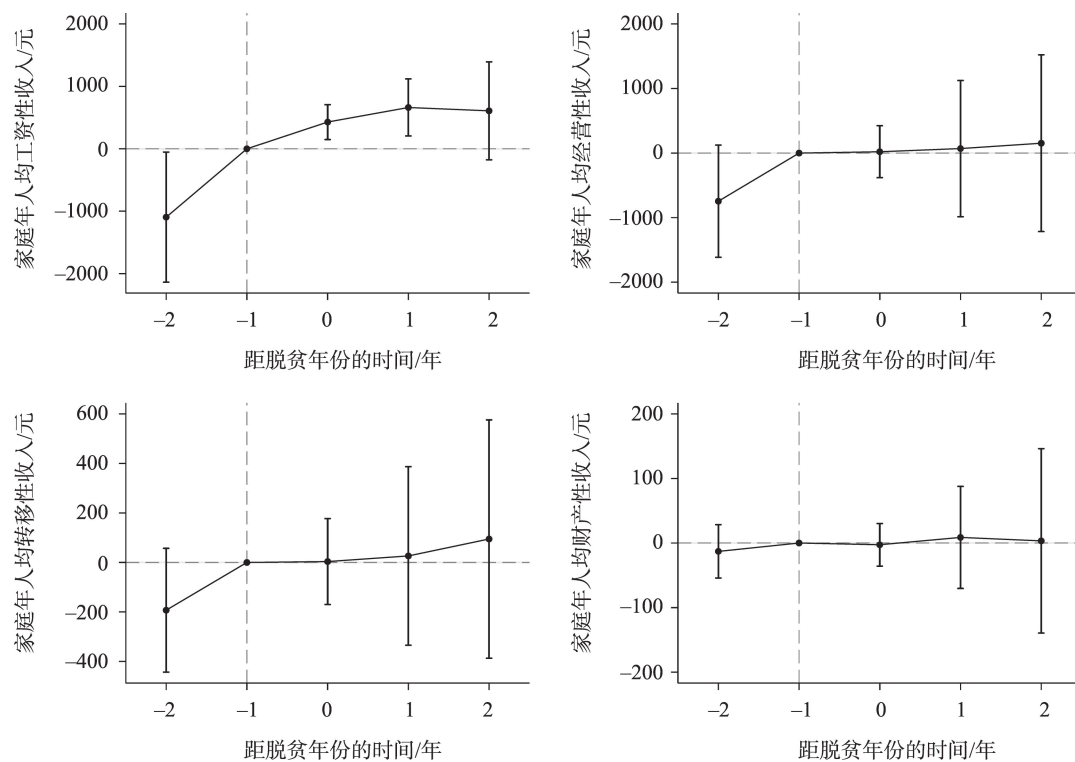


图7 脱贫事件对因缺技术致贫的家庭各类收入的影响

Figure 7 Impact of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income of households impoverished by lack of skills

2022年9月

收入在-2到-1期迅速上升,而后的3年呈平缓上升趋势,说明针对该类贫困户的扶贫措施成效显著。调研发现,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十分重视贫困户的技能培训,建立了涵盖各行业的培训师资源库,并定期组织开展农业种植、建筑工匠、家政服务、旅游服务等产业技能与创业培训。这种技能培训模式不仅帮助广元市因技术致贫的贫困户掌握基础性的工作技能,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促进了因技术致贫的贫困群众获得可持续且稳定的工资收入。此外,参与技术培训和自主创业的贫困户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补贴性收入。

4.3.4 因学致贫

由图8可知,因学致贫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在-2到-1期迅速上升,之后基本不变,转移性收入也略

有提升。这说明,针对这一贫困群体的扶贫政策不仅在短期内解决贫困户子女的教育问题,在较长期内也有助于激发其增收的内生动力。据了解,广元市十分重视贫困群体的教育问题。例如,广元市L县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在校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校园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和补助生活费,并负责其毕业后的就业安置问题。类似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个体的转移性收入,且利于保障其未来工资性收入的稳定性。除提供职业教育外,L县设立企业扶贫基金帮助上学困难的个体,或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给予一次性奖金奖励。由此可见,广元市高度重视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但这些一次性的教育补贴对于整体增收效果的作用有限,因此在图中未看到收入明显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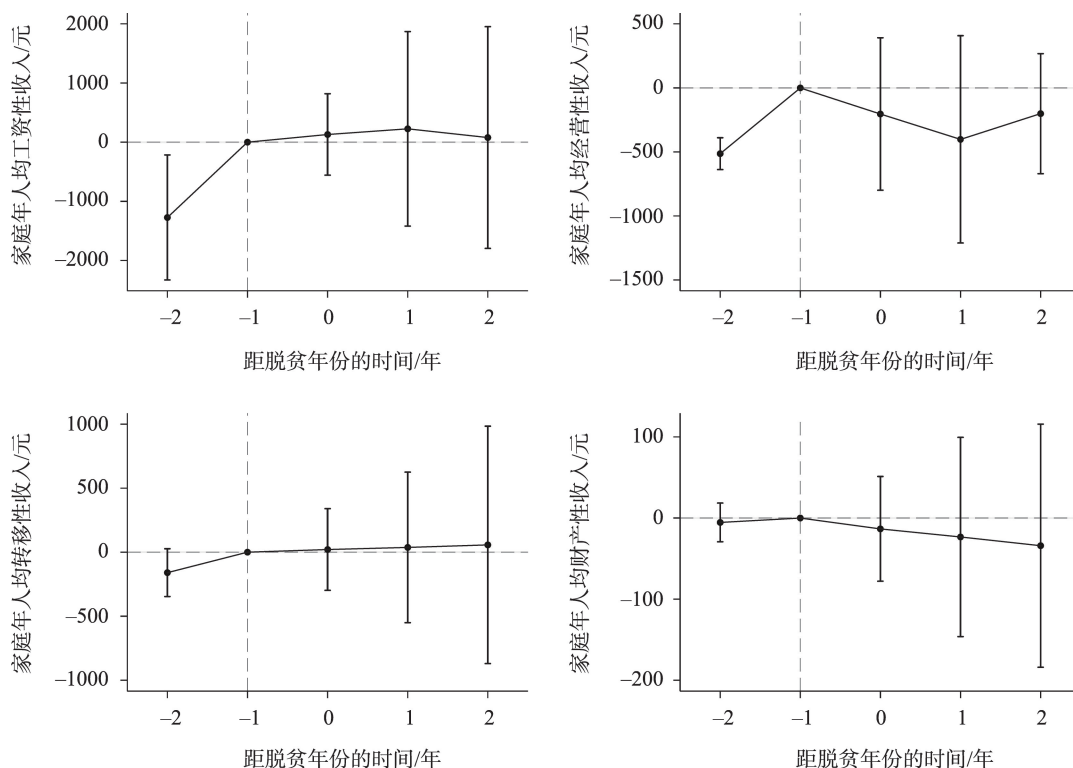


图8 脱贫事件对因学致贫的家庭各类纯收入的影响

Figure 8 Impact of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income of households impoverished by education burden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基于四川省广元市3个县的精准扶贫数据库,采用事件研究法和PSM-DID方法,评估了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家庭收入的中长期影响,

并结合实地调研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展开分析,探究收入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主要结论如下:

(1)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在脱贫前一期,贫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明显增长,其中增长最为显著的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

性收入。脱贫后,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2)针对不同类型收入稳定性的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脱贫后的稳定性较强,主要来自“造血式”的扶贫措施。而更多依赖“输血式”扶贫措施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3)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脱贫户增收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表明,因病、因残和因缺技术致贫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均在脱贫后得到了显著提升,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对因病及因残致贫户提供公益性岗位等灵活就业机会,针对因缺技术致贫户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因学致贫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在脱贫后保持稳定。

5.2 政策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1)通过研究贫困户在脱贫前后各类收入的变化情况发现,工资性收入的增收效果最为明显,经营性收入略有波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为此,当地政府需进一步健全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防止部分脆弱性较强的贫困户因增收波动而导致的规模返贫现象。同时,当地政府应重点关注发展基础较弱、高致贫风险的边缘易致贫户,可加强相关部门监测数据的共享和对接,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对这类群体建立返贫风险预警响应机制。

(2)在4种不同类型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主要来自提高贫困户能力与机会的“造血式”扶贫措施,对于脱贫户增收的可持续性最为重要。为此,应继续统筹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大力拓宽这两类收入的增收新渠道以保障农户未来的收入稳定。在工资性收入方面,农村产业是确保贫困户工资性收入稳定性的关键基础,当地政府应推动更多产业发展要素向乡村集聚,注重农业产业分工细化的长期规划与实施问题,从而促进农村内部劳动分工与合作。在保障农户增收的同时,继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的规模,提升农村产业发展综合效益。在经营性收入方面,既要完善财政、信贷、保险等政策,降低农户经营成本和风险;也要继续提高职业农民技能,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经营绩效。

(3)通过分析致贫原因的异质性发现,因病、因

残和因技术致贫是所有致贫原因中主要的原因,而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对于因病和因技术致贫的脱贫效果最佳。为此,对于因病和因残的贫困农户,当地政府应对于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户继续开发公益性岗位,为这部分特殊人群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上岗的就业机会。此外,继续全面落实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等综合社会保障政策,为因病和因残致贫的农户提供后续保障功能。对于因缺技术致贫农户,应继续深入整合农户技术培训资源,在对农户开展的职业技能等培训中纳入实用性较强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育农户增收和自力更生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保障和稳定农户工资性收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蔡进,禹阳春,邱继勤.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效果评价: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J]. 人文地理, 2019, 34(2): 90-96. [Cai J, Yu Y C, Qiu J Q. Evaluation on effect of national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n rural poor households: Based on double difference model[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2): 90-96.]
- [2] 张博胜,曹筱杨. 精准扶贫政策对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1, 43(8): 1549-1561. [Zhang B S, Cao X Y.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nationa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8): 1549-1561.]
- [3] 陈杰,朱红根,翁辰. 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相对贫困: 基于贫困村与建档立卡的分析[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5): 39-51. [Chen J, Zhu H G, Weng C.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relative rural pover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iling rarer and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J].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22(5): 39-51.]
- [4] 吴本健,葛宇航,马九杰.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 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7): 21-36. [Wu B J, Ge Y H, Ma J J.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erio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 China Rural Economy, 2019, (7): 21-36.]
- [5] 章贵军,欧阳敏华. 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收入改进效果评价: 以江西省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8, (4): 54-64. [Zhang G J, Ouyang M H. Evaluation on the income improvement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based on policy finance: Evidence from Ji-

2022年9月

- angxi Province[J]. China Soft Science, 2018, (4): 54-64.]
- [6] 平卫英, 罗良清, 张波. 就业扶贫、增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四川秦巴山区与藏区调研数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7): 155-174. [Ping W Y, Luo L Q, Zhang B. Employ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income increase effect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0, 37(7): 155-174.]
- [7] 胡晗, 司亚飞, 王立剑. 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 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1): 78-89. [Hu H, Si Y F, Wang L J.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on the livelihoods and household incomes of the rural po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Shaanxi Provi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1): 78-89.]
- [8] 沈宏亮, 张佳. 精准扶贫政策对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的影响[J]. 改革, 2019, (12): 87-103. [Shen H L, Zhang J.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on registered households' income growth[J]. Reform, 2019, (12): 87-103.]
- [9] 乔慧, 刘爽, 郑风田. 精准脱贫背景下建档立卡政策的增收效应测度: 自我“造血”还是外部“输血”?[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40(9): 3-19. [Qiao H, Liu S, Zheng F T. The income effects of filing riser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ematopoiesis” or “transfusion”[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9, 40(9): 3-19.]
- [10] 虞崇胜, 余扬. 提升可行能力: 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J]. 行政论坛, 2016, 23(1): 22-25. [Yu C S, Yu Y. Enhancing viable capabil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J]. Administrative Tribune, 2016, 23(1): 22-25.]
- [11] 李聪, 刘若鸿, 许晏君.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来自陕南的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 (7): 52-67. [Li C, Liu R H, Xu Y J.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9, (7): 52-67.]
- [12] 田芊, 刘欣. 分配公平感及其背后的正义原则[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7): 61-67. [Tian Q, Liu X. Macro-and micro-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related principles[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9, (7): 61-67.]
- [13] 管睿, 王倩, 余劲. 扶贫资源输入对贫困地区分配公平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0, 42(4): 735-748. [Guan R, Wang Q, Yu J.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input to the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4): 735-748.]
- [14] 王介勇, 戴纯, 刘正佳, 等.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思考及建议[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10): 1273-1281. [Wang J Y, Dai C, Liu Z J, et al. Suggestions on consolidating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35(10): 1273-1281.]
- [15] Ravallion M, Chen S H. Benefit incidence with incentive effects, measurement errors and latent heterogeneity: A case study for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28: 124-132.
- [16] 陈国强, 罗楚亮, 吴世艳. 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估计: 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5): 59-76. [Chen G Q, Luo C L, Wu S Y.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public transfer payment[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8, 35(5): 59-76.]
- [17] 左停, 李泽峰, 林秋香.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贫困户脱贫质量及其自我发展能力: 基于六个国家级贫困县建档立卡数据的定量分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 32-44. [Zuo T, Li Z F, Lin Q X. The quality of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or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pover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six 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rie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 32-44.]
- [18] 王庶, 岳希明. 退耕还林、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 基于21省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J]. 经济研究, 2017, 52(4): 106-119. [Wang S, Yue X M. The Grain-for-Green project, non-farm employment, and the growth of farmer incom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4): 106-119.]
- [19] 谢申祥, 范鹏飞, 宛圆渊. 传统PSM-DID模型的改进与应用[J]. 统计研究, 2021, 38(2): 146-160. [Xie S X, Fan P F, Wan Y Y.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PSM-DID model[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21, 38(2): 146-160.]
- [20] Heyman F, Sjöholm F, Tingvall P G. Is there really a foreign ownership wage premium? Evidence from matched employer - employee dat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3(2): 355-376.
- [21] 孙文凯, 王乙杰.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 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再考察[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3): 963-988. [Sun W K, Wang Y J.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s health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6, 15(3): 963-988.]
- [22] 郝项超, 梁琪, 李政. 融资融券与企业创新: 基于数量与质量视角的分析[J]. 经济研究, 2018, 53(6): 127-141. [Hao X C, Liang Q, Li Z. Margin trading, short selling and firm innovation: The perspective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8, 53(6): 127-141.]
- [23] 杜国明, 黎春, 何仁伟. 中国精准扶贫的区域治理思想解析[J]. 资源科学, 2020, 42(4): 649-660. [Du G M, Li C, He R W. Regional governan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4): 649-660.]
- [24] 王士心, 刘梦月. 东西部协作扶贫须做好资源跨区域分配[J]. 人民论坛, 2019, (3): 62-63. [Wang S X, Liu M Y. Cross reg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ast-west cooperation[J]. People's Tribune, 2019, (3): 62-63.]
- [25] Markowitz H M. Portfolio Selec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Income-increasing effects of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in the contex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UANG Yinuo¹, LU Zhixian², SHE Kexin³, LI Guoping¹, LIU Huidi²

(1.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Schoo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atabase of three counties in Guangyuan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this study used the event study an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PSM- DID)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income of the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after they a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We also combined field research to evaluate different typ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analyze whether the income growth is sustainabl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ousehold income level of poor households increased rapidly just before they were out of poverty, and the overall income remained stable afte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increase in wage incom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sustainable,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local “hematopoietic”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home area employment and the employ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to provide flexi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is study also conducte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round different causes of poverty, and we found that the wage income of families impoverished due to disability and lack of skill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because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vide flexible public welfare jobs for the disabled and targeted skills training for families lacking skill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n empirical support for evaluating the dynamic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come-increasing effects;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event stud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Guangyuan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